

ASIAN STUDIES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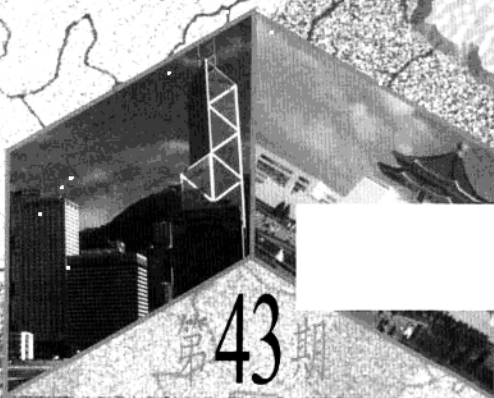
亚洲研究



2002年6月18日出版

ASIAN STUDIES

亚洲研究



2002年6月18日出版

《亞洲研究》第四十三期目錄

第一部分：專 論

- 一、黃康顯：《扭曲的命運！曲線的革命？——1960年
後的馬來亞共產黨》—— 7
- 二、葉明德：《馬來亞華人政治參與型態與困境》—— 117
- 三、丁 偉：《朝鮮半島形勢與中國周邊安全環境》—— 166
- 四、吳前進：《冷戰後華文教育與中國大陸——東南亞
國家之關係互動》—— 184

第二部分：第二屆兩岸三地歷史學研究生 論文發表會

- 一、會議紀要—— 207
- 二、開幕式
- 1、鄭瑞城校長致詞—— 218
- 2、喬寶泰董事致詞—— 219
- 3、劉興漢校長致詞—— 221
- 三、趙立彬：《台北五日行》—— 223
- 四、蕭道中：《兩岸三地歷史學研究生論文發表會紀
實》—— 233

第一部分

專 論

扭曲的命運！曲線的革命？

——1960年後的馬來亞共產黨

黃康顯

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前高級講師

前言、馬共發展的幾個階段

馬來亞共產黨由創黨至今，已超越70年，它和馬來西亞以至新加坡的反殖民鬥爭，抗日戰爭，爭取獨立，完成獨立，以及建國歷程，有數不清的糾纏關係，變成了馬新歷史的一環，因此要深入理解馬新歷史，就不能忽略馬共的一節。

1998年8月的下半旬，吉隆坡的《星洲日報》，曾向馬來西亞總警長拉欣諾作過獨家專訪，並分13篇在該報刊登，題為「馬共始末」，拉欣諾過去的專責是理解馬共，然後對付馬共，因此是最佳的現場目擊者、與歷史方面的證人，當然，為了全面揭露真相，馬共方面的資料是不可缺的。「馬共始末」差不多概括了整個馬共歷史，只是在邏輯的分期方面，仍須進行學術的加工。

其實馬共的歷史，不一定始於1930年，亦不可能終於

1989年，因為和平協議的簽署，只標誌武裝革命的結束，政治意識可能仍然存在；返回馬來亞及新加坡的前馬共成員雖然聲稱放棄共產思想、脫離馬共組織，但馬來亞共產黨仍然沒有解散，大部分馬共分子，仍然長居泰國南部，甚至仍然散布於中國、甚至香港等地。再者，1960年緊急法令的解除、與馬共總部的撤離馬來西亞，並非意味著馬共的發展，只留下1960年至1989年的單一的後階段。在過去70多年來，隨著政局的蛻變，馬共政策方針的改變，其運作與活動方式亦有轉變，因此馬共的發展，應當細分為九個階段。

第一階段是由創黨時的1930年開始，到抗日戰爭前夕的1941年結束。創黨前與印尼共黨、中國共黨，甚至國際共黨的關係，不能忽略。更不容忽略的是創黨後的民運基礎、與滲透方式。這是創立發展的階段。

第二階段是1942至1945年的抗日戰爭、武裝部隊的成立、與華巫二族的矛盾，變成了歷史發展的伏線。而戰後為期僅數週，曇花一現的蘇維埃組織，亦是歷史進程中的異象。這是武裝抗日的階段。

第三階段是由1945年到1948年、短短三年的公開活動的階段，這階段是反殖鬥爭的高潮，民族意識的高漲，獨立要求的高峰，而包括工運、學運的民運技巧，亦得到至高的發揮。馬共的滲透政黨，亦發展至極限。

第四階段是1948年6月20日緊急法令的開始，到1960年7月31日緊急法令的結束，是為期12年零41日的武裝抗英階

段。馬共由早期的聲勢洶湧，到後期的邊打邊退，原因是英軍的心理戰與圍困技巧，瓦解了馬共的游擊戰術與統戰技術，使馬共拿手的民運與滲透策略，發揮不到過去的功效。

第五階段是1960年到70年整整十年的撤退重整，實行瘦身行動，把部隊簡化，同時化整為零，等待機會。民運的工作，全要在泰南，來鞏固基地；只是滲透工作，又再遇到挫折，首先是由人民行動黨分裂出來的社陣，節節挫敗，跟著馬來西亞的勞工黨與人民黨的領導層，紛紛被捕，所謂統一陣線，已差不多全面瓦解，到了最後期，泰南的馬共，又再分裂，有革命派與馬列派的另起爐灶。

第六階段是1971年到1980年的再一個十年的武裝滲透時期，69年的「五·一三」種族衝突，與75年的越共攻入西貢，不久泰共冒起，為馬共帶來新的機會，於是馬共再派突擊隊南下，在吉隆坡的外圍甚至市內製造事件，無論在新或馬，共黨活動有死灰復燃的跡象，而活動範圍擴展至受英語教育的青年、馬來農民，不過一九七四年的中馬建交，對這類的武裝與滲透活動，起了抑制的作用。

第七階段是1981年到85年的統戰調整時期。南下的突擊隊，未能取得如期的成果，鄉村的農民，並未作出響應，至於城市的青年，亦已遠離馬共的影響，其時中國與馬來西亞及東協成員國的關係正逐漸改善，如是所謂民運與滲透，已不能發揮效用，最致命的還是設在中國湖南的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，已於81年停播，意味著中國的支持，已降至精

神上的水平，如是馬共的鬥爭方式，需要調整，變成統戰的口號，期望能與各派人士，組成一個聯合政府，把統一戰線的範圍，進一步地擴大。

第八階段是1985年到89年的和平演變、國際大氣候已變得不利、早期是反英，後期是反美，但連美國亦淡出東南亞，馬共於85年4月29日的55周年宣言中，已不再強調武裝革命，88年6月18日更發出和平訊號，隨著泰共的沒落，砂勞越共黨的走出森林，泰南的馬共革命派與馬列派，亦於87年放下武器，89年更有東歐共黨巨變，蘇聯瓦解，於是馬共與泰馬政府，簽署三方的和平協議，結束為期41年的武裝鬥爭。

但政治思維並不一定立即畫上句號，陳平返回馬來西亞組黨參政的願望雖然落空，馬共在新馬以外的組織並未解散，2000年9月，香港的南島出版社，仍印行了《馬來亞風雲70年》，前馬共成員回到新馬以後的情況，仍值得關注，因此要研究馬共的發展，就不得不補寫1989年12月2日以後的後馬共時期，這個時期，可說是馬共的反芻蛻變的階段。

壹、從持續革命到改變路線

一、撤退與重建

1960年7月31日，馬來亞政府正式宣告，解除執行了

12年零41天的緊急法令，那麼這場內戰，帶來了馬來亞及馬來亞政府甚麼的影響呢？研究馬共的學者史塔斯（Richard Stubbis）作出六點總結：（註1）

第一，這場需要協作的反游擊戰，有助於形成一個高度集權化的聯邦政府制度，亦有助於今後的政府運作。

第二，更有助於加強保安力量，特別是情報的搜集、與內部安全法令的施行，但以上一切，都受到文人政府的管轄，形成一個高度權威的政府。

第三，改變了整個馬來亞的社會與經濟外貌，原因是整個新村計畫，重新安置為數半百萬的人民，加速了馬來亞的都市化。

第四，內戰的後遺症，是加深了種族的猜忌，甚至摩擦，原因是馬來族感覺中，馬共是華裔的組織。

第五，另一的後遺症，是馬來人主導的政府，加速管制華校的發展與資金分配，原因是馬共一向滲透華校。

第六，但內戰同時加緊經濟架構的重整，因為戰略的需要，與新村的開發，都需要鋪設鐵路與公路。

因此對國家而言，是有利亦有弊，對政府而言，是利多於弊，但對華人而言，是弊多於利，馬共並未為華人爭到平等地位，反而種族的摩擦，導致1969年「五·一三」的種族衝突事件，自此華人處於更不利的局面。

相對而言，馬共是失多過得，在12年，馬共被殺的有6,711人，若加上被擒的1,289人，投降的2,704人，一共損失

了10,704成員，而英國與馬來亞方面，警察死了1,346人，軍隊死了519人，合共1,865人，亦即是馬共比軍警多損失5.7倍的人數，平民方面，死的有2,473人，失蹤的有810人，合共3,283人，等於比軍警多損失7成6的生命，（註2）因此引起了平民的反感，亦失去很多平民的支持。

緊急狀態的高潮，是1951年至1953年，每年馬共損失的都超過1,400人，軍警方面，最嚴重的是1951年，死亡的有504人，在1950年，有393人，比起馬共死亡的648人，只少255人，不過自1957年開始，軍警的死亡人數急遽下降，57年與58年分別有11及10人，59年只有1人，到了60年，全無死亡紀錄，同時期馬共投降的人數有所增加，57年是209人，58年升至502人，到了59及60年，數目雖然分別降至86及29人，（註3）原因可能是馬共已撤退至泰南，馬來亞境內所餘的馬共並不多。

到了1960年，無論軍警方面，都無傷亡紀錄，而根據內部安全法令被拘禁的人數，亦只得一百，創歷年的新低，到了1961年，才回升至108人，（註4）因此到了1960年，馬來亞境內的內戰，已差不多結束，恢復到和平狀態。

只不過馬共所付出的代價，是相當沉重的，在1951年，馬共維持了8,000人的武裝部隊，在以後6年，馬共雖然招募了3千人，但失去9千多成員，因此到了1957年，只剩下2千人左右，到陳平撤退到泰南時，馬共只剩下為數約4百人的忠貞分子。（註5）到了這個階段，馬共只是苟存下來。

在缺乏外界支援、及多種壓力下，馬共改變了鬥爭策略，一方面把部隊精簡化，另一方面又進行裁員，把武器收藏起來，化整為零，能潛回馬來亞的就潛回去搞地下活動，潛不回去或風頭太勁的就轉往其他社會主義國家，譬如中國和蘇聯，（註6）陳平亦於1960年12月30日，起程前往中國，（註7）一直到1989年，才首次返回泰南。

那麼陳平下一步的計畫又是甚麼呢？根據當時仍在新馬的吉他畢氏（Richard Clutterbuck）的推斷，是等待機會重臨，正如列寧等待德軍入侵俄國，毛澤東等待到日軍進入中國，共黨若控制印尼，便會影響到鄰近的新馬，1962年馬共的顛覆活動，在新加坡進入高潮，新馬的合併、以至反合併運動，最後導致新馬的分家，都提供很好的機會，因為分家以後，會有更多的種族與政治糾紛，「陳平並未完結，他正敲響戰鼓」。（註8）

馬共的武裝戰線雖然在馬來亞已不再存在，但它的統一戰線，仍在新馬兩地，發揮相當的功能，特別在新加坡，政治的形勢，仍然叫好：

第一，新的政府出現才不過一年，仍未成形，且這個政府，只是自治政府，不像馬來亞，已完全獨立。

第二，而在這個政府執政的人民行動黨，是由親共人士支持的左傾政黨，馬共在後面操縱，已差不多到了奪權的地步。

第三，親共人士控制了大部分的工會、學生會，有充分

的群眾力量，是搞群眾運動的適當時刻。

第四，新加坡靠近親共的印尼，可以利用印尼，作為後勤基地，亦利用印尼，影響新加坡的政局。

第五，若新加坡的前線組織取得成果，共黨控制了新加坡，便可以北上滲透馬來亞，配合由泰南下的馬共，便可上下夾攻馬來亞。

二、奪權的邊緣

李廷輝是研究新加坡馬共的專家，在他的專著中，列出了1954年至1966年期間，馬共的前線與衛星組織。（註9）

前線組織包括了17個學生會，36個工會，30個文化協會，5個農會，兩個小販協會，一個婦女會，及四個政黨；衛星組織是新加坡人民反英聯盟，數目已接近一百。

政黨包括社會主義陣線，人民黨、工人黨及早期的人民行動黨；學生會中，南大的各個學生會及新加坡華文中學學生聯會作為主導，後者包括各華文中學的學生自治會與學生互助會，以中正中學為例，便有歌詠會、辯論會、文學小組及學生互助會等組織。

工會方面，以新加坡巴士工人工會、商行與工廠僱員工會、工廠與店員工會、海港局職員協會；僱員工會、工業工人工會等為較重要，文化協會中，主要是各校的舊生會，再加上一些音樂與藝術團體，農會就概括了農民、鄉民、郊區、亞答屋與木屋居民，小販聯會是以新加坡小販工會為

主，以上組織，已包羅了當時新加坡的各界各業人士。

馬共在新加坡最活躍的時期是1945年至48年，其後走入森林打仗，到了1950年，只留下少許人員及三百多名反英聯盟的人士，根據新加坡政府的一位專家的內部報告（The Communist Party of Malaya：Organization in Singapore, from 1960 to 1968），到了1961年，新加坡的馬共人員，又增加至300至400，參與各類組織活動的人士，多至十萬人以上，（註10）可見其時馬共實力的雄厚，足以顛覆政府，從而引發李光耀及人民行動黨與馬共支持者，一場為期七年甚至以上的政治鬥爭。

李光耀領導的人民行動黨，在1959年的大選中，51席中取得了43席的立法會的大多數，其中的原因，是得到親共分子領導的工會支持，學生組織亦有助選，使英語教育系統的李光耀深入華文教育及講華語的群眾，次年王文元搞分裂，脫黨參加補選，雖然勝出，但仍得不到林清祥為首的左派的支持，由於補選失敗，黨內領導想辭職，但被林清祥等勸阻，原因是怕萬一反共政府登場，會對共黨不利。（註11）

1959年人民行動黨的勝利，共黨在北馬的喉舌報，認為客觀條例是比以前好，只不過「人民行動黨不是無產階級的馬克思主義政黨，因此是有其動搖性格與弱點」，（註12）可見當時親共分子雖然與人民行動黨合作，但並非完全的信任。

至於李光耀，則並非全無警覺，他比喻與親共分子合作，人民行動黨就形同騎上虎背，大選後成立政府，應當是

走下來，和虎搏鬥的時刻。（註13）

在1961年5月，馬共在新加坡的「全權代表」方壯璧約見李光耀，請他繼續留任，並提出多項請求，包括：給予反英人士公民權，准許工會合併，容許更多民主權利，放寬移民管制及書籍進口，並反對星馬合併，為了證實他的權力，他向李光耀表示，會命令其中一位市議員辭職，該位市議員果然辭職，不久馬來亞總理東姑拉曼提出星馬合併的可能，林清祥於6月多次發出書面文件，對合併事宜有所保留，並要求廢除內安法，促成新加坡完全自治。至於其他要求，都與方壯璧的大同小異，到了7月，甚至聯同其他親共黨員，要求李光耀辭職，由李紹祖代為總理。（註14）

由此可見，馬共原先想受庇於李光耀，後來見新馬可能合併，安全受到威脅，兼且羽毛已豐，推翻李光耀的時機已成熟，於是由林清祥發難。方壯璧可輕易命令其中一位市議員辭職，而林清祥的要求，又與方氏的大同小異，足見馬共已有左右新加坡的能力，林清祥等又在7月18日約見英國專員，澄清若然親共分子執政，英國會否阻止，專員的回答是彈性的會依憲法行事，只要不搞暴動便可以了，於是親共分子便「看成英國人的一種信號，認為英國人有意同他們打交道」。（註15）殊不知這是英國人的詭計，希望藉此使馬共跑出前線，好讓李光耀可以走下虎背，和馬共決戰。

這場決戰是艱苦的，在7月15日的安順區補選中，親共分子倒戈支持工人黨的馬紹爾，使他當選，李光耀首先於